

從「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模式 談社會工作理念在矯治機構之運用

江振亨

壹、前言

社會工作 (social work) 的特點包括，它是一門學科，專以研探有關幫助人群調整社會關係，解決社會問題之學問；它是一種專業，專以幫助人們發展內在潛力，運用外在資源以求得自立自主的生活；它是一種技術，專以調適人際關係，維護個人與社會之和諧關係，以求得個人人格之充分發展，基本生活需要之充分滿足；它是一種方法，專以協助個人、家庭、團體及社區，解決社會問題，革新社會制度，訂立社會政策，頒行社會立法；它是一種過程，專指社會工作者所從事之專業服務，以及改進個人之社會服務與社區福利之各種活動過程 (李增祿，1991)。其所含蓋的服務對象，包括了任何有困擾問題的個人 (如心理疾病、自我戕害、藥物濫用、犯罪等)、團體或家庭問題 (如失依、兒童虐待、離婚、無自用住宅等)、社區問題 (如失業、族群衝突、住宅環境、休閒設施等)，社會工作的目的即在協助服務對象，改善社會環境、調適社會關係、增強社會功能 (林勝義，1999)。從上述社會工作特點、對象與目的觀之，對於因犯罪入獄服刑的受刑人，其產生的問題包含有個人、團體

或家庭、社會的問題等，因此亦需為社會工作所應重視的範疇、給予協助及處遇的一群，即矯治社會工作為社會工作領域中重要的一環，所處理的案主，除了受刑人個人外，其家庭亦應為重視的對象，例如入獄服刑後其小孩的身心健康、家庭生活經濟支持、夫妻關係所面臨的危機等均可能產生極大的影響。

有不少的受刑人在入獄前，家庭的關係就已存在不少問題；當受刑人入監服刑後，其家庭關係更是瀕臨破碎的邊緣。我們不難發現這些家庭都有好幾個特色：成員間不懂得彼此體諒、溝通模式不良，以及缺乏正常的家庭功能 (Bayse、Allgood 和 Van Wyk；引自洪娟娟譯，1998)。受刑人本身就是在一個不健全的家庭中長大，在成長過程中缺乏適當的照顧；在社經地位偏低或環境較複雜的情況下，容易走上犯罪之路。服刑事件使得受刑人與家人隔離之後，家庭關係即面臨很大的考驗；這樣突如其來的家庭變故亦容易對其他的家庭成員帶來負面的影響 (周慶芬，1998)。相關的文獻指出：假如受刑人懂得如何修補過往的錯誤，維持良好的家庭關係，將有助於降低再犯率，並改變在獄中的違規行為 (Bayse、Allgood 和 Van Wyk；引自

洪娟娟譯，1998）。由上述的觀點，可以看出矯治社會工作的本質與家庭社會工作的內容具有相關連性。Daniel J. Bayse 所著，由美國犯罪矯治協會（American Correctional Association）所出版的「受刑人家庭教育工作手冊」（註 1）指出，該課程包括三個部分：1.如何服刑期間維持良好的家庭關係；2.如何服刑期滿後重返家園和社會；3.我們要如何對待他。第 1、2 課程是針對在監的受刑人，第 3 課程是邀請受刑人和家屬一起參與（註 2）。從其理念及實施方案中，可以視為矯治社會工作的一種範疇，而其內涵亦為家庭社會工作的實踐。同樣地，在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嘉義大學家庭教育中心所主辦，嘉義監獄協辦的「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從 1999 年 11 月開始，以嘉義監獄空中大學學生為對象，用書信、訪談、家庭日活動、讀書會、成長團體等方式，提供受刑人及其家庭成員多方面的互動與溝通的機會，對於雙方情緒的困擾、生活的適應等均有正向的幫助，同時提供親職教育的過程。就其本質而言亦具有矯治社會工作及家庭社會工作的雙重內涵。

長久以來矯治社會工作在社會工作領域中為最被忽略的一部分，原因乃在矯治體系中並無專業的社會工作人員的編制，加上傳統上矯治機構與外界較少接觸，在社會資源的運用上，停留在以戒護安全思考為優先原則下裹足不前，且存有受刑人出獄後走出圍牆即不干監獄的事的觀念，因此在矯治上無法邁出整體性考量的處遇思維。惟近年來矯治政策的改變，已漸漸重視社會資源的引進，且也重視受刑人的家庭及社會環境為其再犯的重要評估因子，受刑人在監獄內或許已悔改向上，但家庭

及社會環境如無法有所改變則仍是再犯的重大拉力。因此在我國的矯治體系中開始有社會資源運用的初模，且於戒治所的編制內有社會工作人員的編制，但均為起步階段，仍待更多資源與社工人力的投入。

本文旨在探討我國矯治社會工作的概況及簡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與嘉義大學家庭教育中心所主辦，嘉義監獄協辦的「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模式。選擇以「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模式來討論，乃因筆者曾代表監獄參與該方案於研議過程中的焦點座談會，且該方案於監獄實施的對象正為筆者所負責教化的個案，從方案實施後了解個案與家人互動關係的改善，因此希望借由此模式來分析社會工作在犯罪矯治體系未來發展的啟示與方向。

貳、矯治社會工作在矯治機構之現況

一、矯治社會工作的意義與功能

矯治社會工作是指社會工作實施於矯治體系（correctional system）中。協助犯罪者自我了解，與他人建立關係，並擁有社會所期待的生活方式。在矯治體系中，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是協助復健而不是懲罰（徐震、林萬億，1996）。運用社會工作專業知識與技巧，協助犯罪者自我省察、自我改變，重新塑造符合社會規範的行為，以便能夠回到社會成為社會所能接納的一個成員。一般而言，矯治社會工作實施的機構，包括各級法院、少年法庭、家事法庭、少年觀護所、看守所、監獄、矯治學校，以及司法保護組織等（林勝義，1999）。就矯治機構社會工作而言，係指提供適當的矯治方案，依犯罪者的需要，提供補習

教育、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假釋者的重建方案，以及出獄人的更生保護工作（林勝義，1999）。由於上述對矯治社會工作的定義，並無法明確的與矯治機構中輔導人員的角色作明確的區分，因此筆者認為矯治社會工作如能在機構內形成矯治處遇團隊，結合包括輔導員或教誨師、調查員、社工員、臨床心理師、衛生科醫護人員等，更能發揮整體的力量，促進矯治處遇目標的達成。而社工員在此團隊的角色為運用專業的社工知識與技巧踐行圖 1 所示的社會工作者的角色，這些角色包括直接服務的提供者、系統發展者、系統的連結者、系統維護者、研究者及研究使用者。惟這些角色應視社工員在矯治機構內所擔任的職位、工作性質而定，例如歸屬教區的社工員及歸屬教化科（或調查科、或社工科）辦理內勤業務的社工員，所踐行的角色與

境改善、協助犯罪者重組行為模式、從事轉介的工作。

二、矯治社會工作在我國矯治機構之現況

犯罪矯治工作是整體刑事司法體系中重要的一環，亦為刑事司法體系的最後一道防線。犯罪處遇的成效關係著受刑人社會賦歸的可能性，亦影響社會整體治安的良窳。受刑人入獄服刑可能呈現下列監獄化的徵候包括：1.行為上趨於依賴、被動；2.思想陷於停滯；3.人際關係缺乏信任感；4.對監獄內各項事物不關心；5.較高之受暗示性；6.勢利取向；7.不信任管教人員之主張（楊士隆，2000）。因此如無適當矯治受刑人，降低不必要監獄化的負面影響，勢必影響受刑人日後的生活態度。站在犯罪矯正之立場，犯罪人係一社會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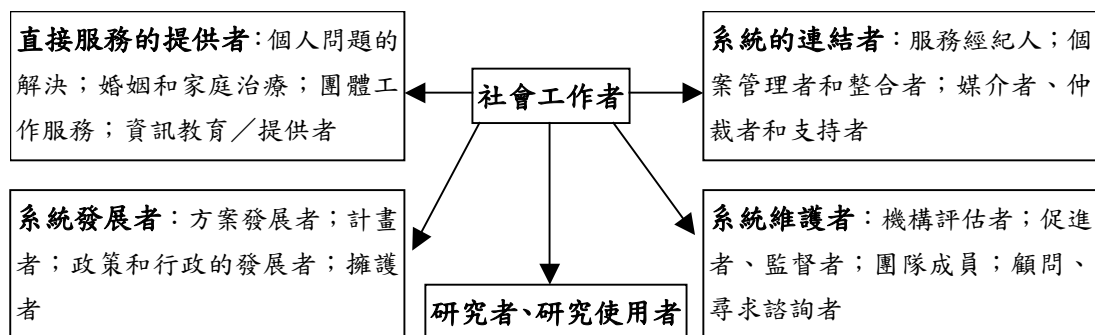


圖 1：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引自 Hepworth, Rooney & Larsen, 2002, p30）

功能就不相同，前者較著重直接服務的提供者及系統的連結者的角色，後者則較著重系統發展者的角色。

至於矯治社會工作的功能包括有（Skidmore, Thackeray, Farley, Larry & Scott, 2000）：協助增強改善的動機、提供犯罪者分享其感受、提供資訊、協助犯罪者做決定、協助犯罪者界定情境、協助環

應欠佳，經常面臨心理衝突，並且在行為上呈現異常之病態者，亟待積極輔導、矯正與治療，以改變其偏差行為，增進賦歸社會後之社會適應，避免再犯（林茂榮、楊士隆，2002）。因此如何增進監獄的專業處遇技術及提升專業的諮商人才，即為受刑人處遇成效的至要關鍵。而其中矯治社會工作亦為機構內矯治處遇團隊之一環，

在矯治上應具有重要的地位。但矯治社會工作在我國矯治體系的運作尚未成熟，相關文獻的討論與正式的研究報告亦罕見，究其原因乃我國矯治體系向來較為封閉，且直到 1998 年處遇藥物濫用者的戒治所成立後，才有專業的社工員編制，依據法務部戒治所組織通則第 8 條，戒治所置「社會工作人員，職務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負責同通則第 3 條第 2 款「關於受戒治人之入所調查、家庭及社會關係評估與處理、社會資源運用、出所後之聯繫等社會工作事項」。戒治所社工員的實際工作現況包括有社工專業工作：如個案工作、團體工作、受戒治人家屬衛教座談、戒治相關宣導資料之製作、支援戒治課程、社會資源連結等。非專業的工作有：直接調查、間接調查、入所指導、指紋建檔、照相分類等。目前戒治所社工員從事專業工作所面臨的困境包括：進修機會少，專業知識停滯不前、缺乏專業的督導、其他工作人員對社會工作人員工作內容不了解或有誤解、軟硬體資源不足、戒治所發展有限，缺乏升遷管道、行政工作太多，從事專業工作的時間被剝奪、工作上的無力感等（台北戒治所，2001）。戒治處遇雖有社工員的編制及開啓社會工作制度引進矯治機構的新頁，但實行之初仍有諸多尚待克服的困境及極待建立具體可行的制度。另則戒治所社工員晉用人員取自三等考試社會行政類科，因此欠缺社會工作相關科系訓練背景者亦分發擔任戒治所社工工作，專業能力有待再強，而欠缺專業的督導及在職進修亦為目前矯治社會工作發展的困境。

至於監獄、看守所等機構目前仍無正式的社工員編制，近年來矯治機構雖漸重

視社會資源的運用，但傾向以社會上的志工入監輔導、更生保護宣導、宗教活動等，並未真正落實矯治社會工作的理念。而較具社會工作性質的家庭連結方面，屬教化科所辦的懇親活動，但一般只是由家屬入監與收容人聊天，並無特別的處遇介入，成效如何亦未見評估。

參、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之計畫目標與實施內涵

以下就「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的實施目標與內容簡述之：

一、計畫目標

「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之目標包括：1.提供受刑人與其子女多方互動與溝通的機會，紓解雙方情緒困擾，使其得以發揮家庭成員之功能，並促進家庭的安定與發展；2.提供機會讓受刑人參與孩子的教育與成長過程，促使受刑人子女之健康發展；3.提供受刑人親職教育的機會，協助受刑人繼續擔任親職，促進受刑人及其家人的心理調適，並減少再犯之可能性，使受刑人出獄後順利回歸社會，適應社會生活，及家庭之重建。4.發展及提倡關於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往後進一步執行時篩選對象之參考；5.促進監獄關於家庭保護及支持服務之可接近性（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與家庭教育中心，1998）。

二、活動內容

「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乃針對目前服刑於嘉義監獄空中大學就學中的受刑人及其家庭進行系列性的措施，推展的活動包括：1.召開督導會議：該方案在籌劃階段即召開三次的焦點團體，由家庭教育中

心、地方政府教育機構（教育局、家庭教育服務中心）、社工機構、監獄之相關部門（例如教化科、戒護科等），交換經驗及討論合作事宜。正式活動實施後，每次的家庭日活動前均召開行前會議、活動後均召開督導會議由家庭教育研究所與監獄主管溝通並交換意見；2.提供親職教育課程：配合空大授課，提供受刑人親職教育相關課程，增進親職知能；3.書信溝通：藉由文字描述來相互溝通，讓受刑人與孩子和配偶間之書信往來的措施。不善文字表達的子女亦可以圖畫，如「我的家」、「在學校的我」等之類的主題，傳達給服刑的父母有關子女的生活面貌；4.受刑人讀書會、電影討論會與成長團體的組成：由中心推介有關「家庭」淺顯易懂的書籍，每週進行讀書研討，由中心資深讀書會帶領人帶領讀書會的進行或進行討論性團體活動。電影討論會則由受刑人觀看指定的影片後進行討論性團體活動。另採小團體方式進行，由嘉義大學諮商輔導系教授帶領受刑人成長團體活動；5.家庭日活動：安排受刑人家庭（受刑人父母、配偶與孩子）赴監參與大團體康樂輔導活動，家庭日活動內容之設計亦配合節日實施，例如母親節、父親節、年節等主題，寓教於樂，增進受刑人與家人間之互動與關係。由嘉義家庭教育研究所研究生及嘉義縣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有豐富團康經驗推廣義工協助帶領家庭康樂活動。6.發表「希望之鴿」：集結收容人的成長史，編輯出版「希望之鴿」一書（上、下冊），並舉辦新書發表會。

三、實施原則

關於受刑人的家庭支持方案，先進國家之經驗，注重：1.提供受刑人信任與尊

重的學習環境，提供人性化管理；2.讓學習者能夠積極參與，使方案能符合受刑人本身的意願與需求；3.促進受刑人對自我學習過程負責，進而鼓舞較高層次的自我負責；4.評估結果持續回饋給當事人。「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的實施原則著重：1.如何誘發受刑人表達情感與自我反省的能力；2.提供受刑人學習兒童發展概念、如何與家人相處、溝通、父母管教子女技巧等基本能力等（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與家庭教育中心，1998）。

肆、「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 在矯治社會工作上之內涵

對於入監服刑的受刑人，家庭能否真正給予其支持，端賴受刑人在服刑期間家庭關係是否堅固。研究指出不少受刑人來自破碎家庭，在成長過程中沒有得到父母親適當的照顧，以致他們也無從學習如何當一個負責任的父親或母親。再加上身在監獄裡，與家人分離，不單無法分擔家計，甚至需要家人幫忙，來滿足物質上的需要，這使得受刑人感到挫折、無助和沮喪。這些更加深了受刑人的無力感，也惡化了與家人的關係。另一方面，當受刑人服刑完畢，重返家園時，往往會帶給家庭更多的壓力及焦慮，其中原因有四：1.受刑人入獄前，其家庭關係就已存在問題。2.因受刑事件，其家屬無法接納受刑人，甚至排斥他，避不見面。3.服刑期間漫長，受刑人已不太能適應社會及家庭生活。4.受刑人服刑期間，家庭已產生巨大變化，如權力的分配、離異等；當受刑人回家後，家庭成員又重新調整。因此受刑人在出獄前，就必須給予適當的輔導或處遇，學習

家庭生活的技巧，修補過去對家人造成的傷害，做個負責任的家庭成員；並配合家庭作好心理準備，讓受刑人出獄後馬上得到家人的接納及支持；幫助受刑人克服各種壓力，將可達到預防再犯的目的，亦可實踐重建家園的理想（周慶芬，1998）。Showalter 及 Jones（1980）曾指出，運用婚姻及家族諮商可以改善人犯的矯治成效，有助於人犯夫妻之間的溝通，同時推薦由社會工作人員在監獄中從事婚姻及家族諮商。因此「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在監獄內實施，為國內矯治體系中的一大嘗試，且深具意義，若從社會工作的觀點切入分析「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的社會工作內涵，可以就理論與實務兩個面向來分析其所具有的意義。

一、從社會工作理論角度切入

矯治社會工作是指司法暨矯治機構的社會工作實施，它包括各級法院、少年法庭、家庭法庭、兒童法庭、少年輔導機構以及司法保護組織等機構中之社會工作。在這些機構中社會工作者的共同專業職責是：對當事人及其家屬的福利服務，以處理因犯罪而帶來的個人和家庭的生活難題，以及預防因犯罪而可能產生的家庭困難，其中包括各種低社會暨經濟階層人民，應享受的福利服務的提供（廖榮利，1996）。從這個立論觀點，社會工作在矯治機構的實施包括服刑的案主及家屬，其處理或協助的標的，在於個人的、家庭的問題，及兩者之間交互作用下可能產生的問題，即單一方面改善並不一定能改善另一方面，因此兩方面的改善對於案主及其家庭更具預防往後問題發生的效果。

從家族治療（Family Therapy）的理論

觀之，在一個家庭裡，任一位成員的行動都會影響到其他的成員，那些被影響的成員，他們的反應又會回過頭來影響原先的個人（Corey, 2001；引自鄭玄藏等譯，2002）。家族治療（family therapy），顧名思義就是將家族視為一個整體予以治療。它是一種以整個家族系統為中心，而非以個人為中心的治療方法。家族治療的基本假設是：「家族是一個整體，即使對成員做個別治療，還是不能夠解決基本上的問題。」（呂勝瑛，1992）。家庭系統觀認為了解個人最好的方法，是從評估當事人家庭中整個的人際關係脈絡，以及家人之間的互動模式來著手。家庭中個人所出現的症狀，通常被視為他在家庭之中功能失常的表現，學者認為這些功能失常的行為模式，通常已經傳遞了好幾代。這樣的看法是一種革命性的觀點：當事人的問題顯示出系統運作的狀況，而不只是個人失調、生命史，或是個人心理社會發展的症狀。這個觀點基於以下的假設，當事人的問題行為可能是：1.符合家庭的某個功能或目的；2.家庭無法有效運作的結果，特別是處於家庭轉變的過渡時期；3.是一個症狀，它衍生於家庭世代沿襲下來的功能失調模式（鄭玄藏等譯，2002）。所有的家庭治療工作者都同意一個中心原則：當事人和他的生活系統緊緊地聯繫著，系統中某一部分的改變，會對其他部分造成影響。因此在治療上他們會將所有的「家庭成員」，甚至更大的「環境脈絡」認定為必須處理的「當事人」。因為一個家庭是一個交互作用的單元，它擁有自己的一組特性，如果沒有觀察家庭成員交互運作的互相影響，或是當事人和家庭所生活的更大脈絡，就很難正確地評估個人的問題（鄭玄藏等譯，

2002)。

從家庭支持方案的計畫目標（提供受刑人與其子女多方互動與溝通的機會，紓解雙方情緒困擾，發揮家庭成員功能，促進家庭的安定與發展；提供機會讓受刑人參與孩子的教育與成長過程，促使受刑人子女之健康發展；提供受刑人親職教育的機會，協助受刑人繼續擔任親職，促進受刑人及其家人的心理調適，使出獄後順利回歸社會，適應社會生活及家庭重建等），對應上述理論的觀點，可以發現與家族治療理論所強調的內涵是一致的，包括：1. 對家庭的看法：如果我們希望有療效地幫助當事人，則考慮當事人處於家庭系統中是相當重要的。個體不適應的行為來自於家庭系統，也來自於更大的社區和社會系統。2. 家庭治療的焦點：強調家庭內的關係如何使問題症狀發展和延續下去。關心「此時此刻」家庭系統中的互動情形。並重視語言和非語言溝通。3. 一般性的目標：為採取有效的介入措施，使個體和家庭能夠改變，進而減輕壓力。4. 治療者的角色：為扮演教師、示範者或教練的角色，致力於協助家庭成員們學習新的、更有效的互動（鄭玄藏等譯，2002）。由於社會工作採取科際整合的觀點，因此家族治療理論亦適用於矯治社會工作中團體社會工作及個案的社會工作，加上晚近社會工作採行綜融社會工作（generic social work）的綜合取向作法，因此家庭支持方案的運作亦屬於社會工作的一種理論及實務模式。

從家庭支持方案的計畫目標對應社會工作理論中生態觀點／生活模型理論的觀點，生態觀點／生活模式主張，個人的問題乃是個人與其所在空間的生態系統間不協調，個人的生命發展歷程中會遭遇一些

可預測或不可預測的壓力，調適的狀況視個人運用環境資源與環境對個人支持的程度而定。協助個人提升壓力管理的能力；影響社會及改善環境條件以滿足個人發展所需；增進個人運用環境資源的能力，協助重建或建立個人與環境的良好交流（宋麗玉，2002）。因此家庭支持方案與該理論所強調的，「增進個人因應的能力與適應力，並改善社會環境以助於個人生存與發展」之目標是一致的。

從家庭社會工作的內涵觀之，家庭社會工作乃是提供一連串的服務，以強化家庭生活及援助家庭成員適應社會上的問題為目的。係針對家庭整體來處理，所以家庭社會工作也含有綜合、調整的功能（李增祿，1991）。對應家庭支持方案的計畫目標，顯示該方案除了具備矯治社會工作的內涵外，同時亦為家庭社會工作的一環，例如該方案提供受刑人與其子女多方互動與溝通的機會，紓解雙方情緒困擾；提供機會讓受刑人參與孩子的教育與成長過程，促使受刑人子女之健康發展；促進受刑人及其家人的心理調適、以助將來出獄後家庭重建等。

二、從社會工作實務角度切入

從事直接服務的社會工作者應備的能力或技巧包括：心理治療的角色；問題解決技巧面談（interviewing）、評估（assessing）、介入（intervening）技巧；團體領導的技巧；形成自然的協助網絡（forming natural helping networks）等（Hepworth, Rooney & Larsen, 2002）。社會工作直接服務的哲學觀包括（Hepworth, Rooney & Larsen, 2002）：

1. 案主可能面臨的是社會的、社會系

統的或個人的資源缺乏，這些缺乏可能單獨存在、也可能同時併存的。

2.社會工作者應努力協調社會系統，以支持案主的改變，並在案主有尊嚴的情況下使其獲得需要的權利、資源和處遇。

3.人有自我決定與選擇的能力，社會工作者致力於增進案主的能力並培養案主的自我決定能力，以增進案主對所處環境的影響力。

4.社會工作者發揮教育的功能，使服務傳輸的體系有系統的方式，在案主心理健康、問題解決能力，和所擁有的支持系統為前提下，提供案主所需的服務。

5.對於非自願的個案，雖然社會工作的哲學觀主張人們有維護自己尊嚴和利益的權利，但當案主的行為傷害他人權利時，社會工作者應協助案主面對自己的困境。對於此種個案，社會工作者應具備協商（negotiation）的技巧。

6.對於主動求助的個案，社會工作者應藉由接納和適當的自我表露，以增進案主的自我覺察和現實感。

7.無論自願或非自願，社會工作者都應以尊重和肯定其價值的態度，使案主具有與他人相同的選擇機會。

8.案主有能力學習新的技術、知識、方法以解決自己的問題。社會工作者有責任協助其覺察自己的能力，並支持他們有成長與改變的能力。

以社會工作實務角度來分析，「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的理念符合上述社會工作直接服務的哲學觀，包括：了解案主與其家屬所面臨的問題；尊重案主與其家屬自主選擇參與方案與否的權利；透過活動前及活動後的問卷回饋單，了解活動進行上的問題及參與者的心得，以提供最適案主

及其家屬所需的活動內容；在活動的設計上安排促進家庭功能重建的課程，在活動引導上催化成員間親子互動，包括語言上及肢體上的接觸。

另則家庭支持方案實施過程中，工作人員在該方案中呈現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包括有：

1.直接服務的提供者角色：個人問題的解決；婚姻和家庭治療；團體工作服務；資訊教育/提供者。

2.系統發展者角色：方案發展者；計畫者；政策和行政的發展者；擁護者。

3.系統的連結者角色：媒介者（例如方案初期的家庭訪視，促進案主與其家屬雙方互動意願的連結，進而在往後的活動中促成雙向的溝通）和支持者（例如在活動的進行中對案主及其家屬良好的互動提供正向的支持，增強如此行為的出現）。

4.系統維護者的角色：促進者、監督者；團隊成員；顧問、尋求諮詢者。

5.研究者、研究使用者的角色。

伍、結語：

家庭支持方案對矯治社會工作的啟示

犯罪學研究顯示：犯罪人的家庭因素，包括家庭生活及家庭氣氛，係犯罪病理因素之根結。所以在監受刑人及期滿出獄或假釋者應實施有助家庭重建、家人關係、危機調適等教育訓練課程，正可幫助受刑人適應社會生活中的家庭生活，也是犯罪矯治機構中的矯正處遇重要環節。犯罪矯正的目標即是刑罰執行的最終方向，就是使出獄人返回社區，統整入社會。而家庭是社會最基本單位，人類生命來源，生活寄託所在，統整入社會，最重要的首

先應成功的統整入社會基本單位的家庭（周震歐，1998）。

人犯時常拒絕參與矯治方案，然而一個人犯家屬參與的方案不但可以有助於克服這種拒絕參與的問題，且亦有助人犯及其家庭。許多研究亦指出與家屬的互動可以幫助人犯達到正面的影響。婚姻及家族諮商是一個對人犯的態度及行為導引實際上改變的有效工具（Showalter & Jones，1980）。「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是一個持續型的處遇方案，同時具有矯治社會工作與家庭社會工作的性質及內涵，並具家庭治療的心理諮商功能及社會工作的生態觀點/生活模型理論及各種社會工作實務角色的內涵。目前已在嘉義監獄對空大學生及其家屬實施三年多。從參與的成員、其家屬及推行此方案的工作人員體會中，均呈現正向的成效。從家庭支持方案的經驗中來看矯治社會工作的發展，筆者認為具有下列的重點：

- 1.矯治社會工作的推展應列為現行矯治模式的重要的一環，如此監獄的處遇將能以更多元的角度來發展，以因應社會的變遷，以能更有助於收容人社會的賦歸及家庭的重建。

- 2.家庭支持方案值得推展，但由於目前實施的對象為空大受刑人，其家人在支持的動機上可能較一般受刑人強，將來實施可以分兩個方面，一為對於其他監獄的空大受刑人及家屬應可以目前模式實施，另則，對於一般受刑人則應對適用對象作篩選，並對方案作必要的修正。

- 3.矯治機構，特別是監獄，應編制社會工作員，以發展資源連結、生態系統或社會網絡治療的理念，對以往忽略受刑人出獄後家庭因素對其再犯因子的影響應作

觀念上調整，加強受刑人正向家庭關係的連結，消除外在拉力的再犯因子（家庭解組），以健全其外在的控制環境。

- 4.以社會工作的角度來看家庭支持方案，其涉及的角色甚多，在矯治機構內之推行，宜採綜合式的分工團隊工作方式實施，在未編制正式的社工員前，可由教化科及調查科主辦，加強教誨師及調查員的諮商輔導、社會工作的理論及實務知識。至於已有社工員編制的戒治所，可以由社工員、輔導員、臨床心理師組成一科際整合的工作團隊共同實施。

- 5.專業督導及行政連繫體系之建立至為重要，從家庭支持方案的辦理可以發現，該方案在行前的行政連繫及事後的督導，均有助於方案的推行，問題的化解及事後的檢討與改進，以提供案主最佳的服務。

刑罰思潮已由威嚇報應走向教化、改善主義，對犯罪人進行各項輔導處遇措施，提供其自我改善的機會乃各先進國家矯正實務的一致目標（林茂榮、楊士隆，2002）。從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的角度來分析家庭支持方案的意涵顯示，矯治工作應有更為寬廣的思維，以能在預防與矯治犯罪問題上有新的作法與成效。無論是矯治機構自行運作的模式、或與外界資源共同合辦的方案，均顯示在面對 21 世紀的矯治新趨勢，已走向更多元面向的策略聯盟或科際整合的團隊合作，此為矯治社會工作未來結合矯治處遇措施必走的方向。對於未來犯罪矯治趨勢呈現矯治處遇技術多樣化的現象，國內的矯治體系亦必將走出這一步才能因應時勢社會之所需。

（本文作者現任嘉義監獄教誨師）

📖 註 釋：

註 1：國內由周慶芬、洪娟娟等人翻譯中文版，1998，台北：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註 2：該方案曾於 1998 年由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得到教育部補助及法務部的支持下，在台北看守所及台中監獄試辦。

📖 參考書目：

宋麗玉、曾華源、施教裕與鄭麗珍（2002）。社會工作理論——處遇模式與案例分析。台北：洪葉。

李增祿（1991）。社會工作概論。台北：巨流。

周慶芬等譯（1998）。受刑人家庭教育工作手冊。台北：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原著 Daniel J. Bayse，由美國犯罪矯治協會（American Correctional Association）所出版。

周震歐（1998）。受刑人家庭教育工作手冊序。周慶芬等譯（1998），台北：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呂勝瑛（1992）。諮商理論與技術。台北：五南。

林勝義（1999）。社會工作概論。台北：五南。

林茂榮、楊士隆（2002）。監獄學—犯罪矯正原理與實務。台北：五南。

徐震、林萬億（1996）。當代社會工作。台北：五南。

楊士隆（2000）。受刑人累再犯問題與舒緩對策。犯罪矯正第十四期。台北：中華民國犯罪矯正協會。

廖榮利（1996）。社會工作概要。台北：三民書局。

鄭玄藏等譯（2002）。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與實務。台北：雙葉書廊。

台北戒治所（2001）。「我！我？我。團體」成果發表暨戒治工作檢討會。桃園：台北戒治所。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與家庭教育中心（1998）。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說明。嘉義：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

Hepworth, D. H., Rooney, R. H., & Larsen, J.A. (2002). Direct Social Work Practice-Theory and Skills, sixth edition. US: Books/Cole.

Showalte, D., & Jones, C.W. (1980). Martial and Family Counseling in Prisons. Social Work. Vol.25 Issue 3, p224-228.

Skidmore, R. A., Thackeray, M. G., Farley, O. W., Larry, L. S., & Scott, W.B. (2000).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Eighth Edition. Allyn and Bacon.